

引用格式：

刘某承, 苏伯儒, 闵庆文, 李文华. 农业文化遗产助力乡村振兴: 运行机制与实施路径[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22, 43(4): 551-558.

Liu M C, Su B R, Min Q W, Li W H. The mechanism and approach of agricultural heritage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J].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22, 43(4): 551-558.

DOI: 10.13872/j.1000-0275.2022.0059



## 农业文化遗产助力乡村振兴：运行机制与实施路径

刘某承<sup>1</sup>, 苏伯儒<sup>1,2</sup>, 闵庆文<sup>1,2\*</sup>, 李文华<sup>1</sup>

(1.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100101; 2. 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 100049)

**摘要:** 当前, 如何帮助乡村从“衰落”走向振兴是世界各国普遍面对的难题。农业文化遗产传承至今的品种资源、农业技术、知识体系和系统结构功能目前仍可发挥重要作用, 如何利用古老的农业文化遗产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本文基于农业文化遗产资源禀赋, 分析农业文化遗产助力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 探讨其运行机制和实施路径。研究表明, 农业文化遗产系统蕴含乡村振兴所需的生物资源、技术资源、生态资源和文化资源。遗产地可以利用农业文化遗产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 提升农产品价值, 发展乡村旅游, 传承传统文化, 最终实现遗产地的乡村振兴, 从而形成了产品增值驱动、乡村旅游驱动和农耕文化驱动等助力乡村振兴的运行机制。构建了农业文化遗产助力乡村振兴的实施路径, 包括推进三产融合发展、积累优秀人力资本、促进农耕文化繁荣、保护优良生态环境和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5 个方面。因此, 提出加强农业文化遗产价值评估研究、建立遗产地生态补偿机制和实施农业文化遗产乡村振兴系列工程等政策性建议。

**关键词:**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乡村振兴; 运行机制; 振兴路径

中图分类号: F3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275 (2022) 04-0551-08

### The mechanism and approach of agricultural heritage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LIU Mou-cheng<sup>1</sup>, SU Bo-ru<sup>1,2</sup>, MIN Qing-wen<sup>1,2</sup>, LI Wen-hua<sup>1</sup>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 Currently, helping rural communities from declining to revitalizing is a great challenge faced by many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Various resources,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knowledge system and ecological function inherited from the agricultural heritage can play important roles. Based on the resource endowment of agricultural heritage,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basis for agricultural heritage to help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discussed its operating mechanism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Result shows that the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 contains biological, technical, ecolog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needed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heritage site can utilize the unique resource endowment of agricultural heritage to promote loc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develop rural tourism, inheri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finally realize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As a result, three operating mechanisms which can help rural revitalization have been formed: product value-added, rural tourism-developed, and agro-culture-driven. Meanwhile, this paper also identified five implementation paths for agricultural heritage to help rural revitalization, including promoting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three industries, accumulating excellent human capital, promoting prosperity of farming culture, protecting excellen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 Party organizations. To make better use of agricultural heritage to help rural revitalization, this paper provides som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agricultural heritage value assessment research, establishing an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 for heritage sites, and implementing a serie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projects in heritage sites.

**Key words :** GIAHS (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China-NIAHS (National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rural revitalization; operating mechanism; implementation path

基金项目: 中国工程院咨询项目(2021-XBZD-8); 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北京市创新团队项目。

作者简介: 刘某承(1983—), 男, 陕西汉中, 副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生态经济学, E-mail: liumc@igsnr.ac.cn; 通信作者: 闵庆文(1963—), 男, 江苏徐州, 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生态农业与农业文化遗产, E-mail: minqw@igsnr.ac.cn; 李文华, 男, 山东广饶人, 中国工程院院士。

收稿日期: 2022-07-05; 接受日期: 2022-07-30

**Foundation item:** Consulting Research Program of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 (2021-XBZD-8); Beijing Innovation Team Project of Modern Agricultural Industry Technology System.

**Corresponding author:** MIN Qing-wen, E-mail: minqw@igsnr.ac.cn.

**Received** 5 July, 2022; **Accepted** 30 July, 2022

从世界各国现代化历程来看,“乡村衰落”是伴随城市发展的普遍现象<sup>[1]</sup>,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城乡差距扩大、乡村衰落也是我国当前在快速发展中面临的现实问题<sup>[2]</sup>。2017年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开启了全面建设现代化乡村的新征程。如何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道路具有重要意义<sup>[3]</sup>。中国5000多年的游牧和农耕历史衍生出了灿烂的农业文明,劳动人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发展并世代传承了具有丰富的农业生物多样性、完善的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独特的生态与文化景观的农业生产系统<sup>[4]</sup>,可为民族文化丰富、生态脆弱且重要、经济落后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经验和智慧。

已有研究表明,导致乡村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快速城镇化、人口外迁、产业结构单一和农村环境污染等<sup>[5-7]</sup>。众多国内外研究者针对如何实现乡村振兴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如Zhou等<sup>[8]</sup>分析了土地整治助力乡村文化、人才、生态、产业和组织振兴的驱动机制;Yang等<sup>[9]</sup>研究探讨了乡村旅游对农村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Xue等<sup>[10]</sup>研究表明,可持续的农村教育对于乡村振兴具有关键作用。

现阶段,关于如何实现乡村振兴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工程等方面。同时,大量研究表明,农业文化遗产在遗产地对乡村振兴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傅志强和黄璜<sup>[11]</sup>研究表明,农业文化遗产可为第一产业、农产品加工业和旅游业有机融合发展提供良好基础;陈茜<sup>[12]</sup>从分布地域、蕴含价值等方面分析了农业文化遗产与乡村振兴的紧密联系;闵庆文和曹幸穗<sup>[2]</sup>认为农业文化遗产蕴含的生物、技术、文化“基因”对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农业文化遗产助力乡村振兴的运行机制如何,农业文化遗产蕴含的资源如何助力乡村振兴尚待进一步探讨。鉴于此,本文基于农业文化遗产资源禀赋,分析农业文化遗产助力乡村振兴的资源基础;根据农业文化遗产蕴含的独特资源,探讨其助力乡村振兴的运行机制,明确其助力乡村振兴的实施路径,研究结果可以为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振兴与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 1 农业文化遗产及其保护途径

200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发起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GIAHS)”保护倡议,旨在保护和传承具有突出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多种功能价值的传统农业系统及其景观、生物多样性、知识

和文化<sup>[13]</sup>。

我国是最早参与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工作的国家之一,2005年“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被FAO列为首批GIAHS保护项目,现拥有18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数量位居各国之首。同时,我国于2012年在全球率先开展国家级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挖掘与保护工作,截至目前农业农村部共发布6批138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分布在153个县(市、区)。

复合性、活态性和战略性是农业文化遗产的三大特性<sup>[14]</sup>。“动态保护”是基于农业文化遗产特性的内在要求。动态保护有三层含义,一是发展与保护结合,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不能像古建筑一样封闭式保护,而应当促进遗产地居民与外界的交流,通过发展生态旅游等产业,避免遗产地贫困状况加剧;二是多方参与,当地农户既没有独立保护农业文化遗产的能力,也没有独立保护的积极性,政府、企业、社区等应当共同制定多方参与机制。三是变中求稳,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不能变化过快,不能一味追求经济效益而完全摒弃原有的农耕方式与民俗信仰,遗产地在发展产业时不能忘记保护的初衷,避免遗产地彻底沦为商业景区。

## 2 农业文化遗产助力乡村振兴的资源基础

农业文化遗产是一种“活”的遗产,现如今依然发挥农业生产等功能<sup>[15]</sup>。截至目前,23个国家和地区的65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系统以可持续方式供应多种产品和服务,为亿万小农保障粮食和生计安全<sup>[16-17]</sup>。

### 2.1 农业文化遗产系统蕴含乡村振兴所需的生物资源

古代先民们在农业文化遗产上千年的发展历史中选育出了大批质量上乘、品质极佳的优良作物,与现代技术融合后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如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中曾种植过20多种传统水稻品种,生长有6种鲤鱼,5种其他鱼类,保育有较高的水稻品种多样性与田鱼遗传多样性<sup>[18]</sup>,其农田边界保育有较高植物多样性及与之共生的AMF群落<sup>[19]</sup>。浙江绍兴会稽山古香榧群的香榧籽油能选择性降低油脂,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其假种皮也是高级芳香油的极佳原材料<sup>[20]</sup>。

我国部分地区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间存在严重的“争地矛盾”,农业文化遗产具有丰富的农作物品种,在为人类提供高产优质的粮食作物的同时,还提供了多种经济作物与工业原料,不仅能保障遗产地粮食安全,还能促进当地第一产业全面发展。

## 2.2 农业文化遗产系统蕴含乡村振兴所需的技术资源

农业文化遗产所蕴含的适应当地独特自然和社会条件的传统栽培技术、种植模式和水土资源管理方法在千百年的人工选择中长盛不衰，通过改善系统内部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达到提升农产品质量与生态系统功能的目的。

江西崇义客家梯田的村民常用间种套作、农田冬翻和灯火灭虫等古老方法防治农田害虫，肥料主要为人畜粪尿、火土灰和枯饼等农家有机肥，部分地区还施用牛骨粉，秋收后鸡、鸭等家禽散养在田间，其粪便与秸秆共同发酵，增强土壤肥力<sup>[21]</sup>，还提升了稻谷内在品质<sup>[22]</sup>。四川郫都林盘农耕文化系统的水旱轮作制度是流传千年的传统耕种制度，其主要分为传统二元轮作（稻—菜）模式和传统三元（稻—菜—菜）轮作模式，这两种模式的地下水补给量分别为 539.1 mm 和 469.2 mm，远高于现代三元（菜—菜—菜）轮作模式（177.5 mm）<sup>[23]</sup>。此外，还有浙江庆元香菇文化系统蕴含的“剃花法”香菇种植技术、内蒙古敖汉旱作农业系统的旱作农业技术、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孕育的乌龙茶制作技术等众多古代先民们遗留下来的农业技术瑰宝。

现代耕作技术通过长时间连续耕种和无节制使用农药化肥来提高农作物产量，这不仅会加剧农田水土流失，还会导致农田肥力急剧下降，最终陷入“土壤肥力越垦越贫”这一恶性循环。遗产地农户在上千年的实践经验中，逐渐总结出多种环境友好型耕作方式，使农业文化遗产在保证一定农作物产量的同时，可以尽量减少对耕地未来生产潜力的透支。

## 2.3 农业文化遗产系统蕴含乡村振兴所需的生态资源

现代农业的集约化发展使得农业面源污染等生态问题愈发严重<sup>[24]</sup>。已有研究表明，农业文化遗产独特的景观格局与水土资源利用模式，使其具有更高的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能力。如浙江绍兴会稽山古香榧群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86.14 万元/(hm<sup>2</sup>·a)，远高于我国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平均水平<sup>[20]</sup>。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作为一个有机生态整体，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远高于桑园生态系统和鱼塘生态系统提供的价值之和<sup>[25]</sup>。

还有研究者探析了农业文化遗产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水平较高的生态学机理。如稻鱼共生系统中鱼的排泄物会降低甲烷排放<sup>[26]</sup>；由于草鱼的捕食行为，稻飞虱数量减少 45%，水稻根部的纹枯病菌会被田鱼食用，从而降低纹枯病发生概率<sup>[27]</sup>；而且鱼的粪便中 N 素形态主要为铵态氮，易于水稻吸收<sup>[26]</sup>，可以减少氮肥施用量。

国外关于农业文化遗产的研究也有类似发现。位于南美洲的古台田农业系统能提供众多独特的生态系统服务：一是气候调节服务，有效保护农作物免受夜间霜冻；二是养分滞留服务，古台田农业系统的部分土壤长期或间歇性位于水面之下，能提高磷的可用性<sup>[28]</sup>。

同时，由于现代农作物品种单一化导致了农田生物多样性锐减<sup>[29]</sup>，病虫害加剧<sup>[30]</sup>等生态问题，而农业文化遗产地被喻为中国良种活态基因库，保育了丰富的农业生物多样性，有效解决了这些问题。现代农业科技正高速发展，但农业文化遗产中流传千年的生态学机理仍值得去探索。

## 2.4 农业文化遗产系统蕴含乡村振兴所需的文化资源

农业文化遗产为乡村振兴发展保留了深厚的文化积淀，包括语言、集体记忆、价值观、社会组织、民俗与节庆、传统知识与技术、信仰与禁忌等，反映在契合当地气候、环境与资源条件的建筑文化、饮食文化和服饰文化，符合当地自然条件反映生物生长物候节律的农事历法，能够推动遗产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可持续生计方式、理念和行为模式，以及其他协助人类形塑集体记忆的物质和非物质遗存等<sup>[31]</sup>。

乡村民俗文化是农业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农业文化遗产上千年的发展中，诞生出了众多人民喜闻乐见的民俗传统、博大精深的农耕文化和深邃饱满的精神产品<sup>[32]</sup>。四川郫都林盘农耕文化系统位于四川盆地西缘是川西农耕文化的发源地，紧贴“胡焕庸线”及羌、藏与汉族的民族交融线。据郫都党史地方志办公室编著的《郫县民俗集萃》显示，郫都共保留有 74 条日常生活民俗、128 条经济民俗、117 条民间信仰、176 条民间文艺与游乐和 23 条民间科技等。

## 3 农业文化遗产助力乡村振兴的运行机制

农业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包括农业生态系统维持食物生产韧性的可持续性，农业多功能维持当地居民生计安全的可持续性，集体记忆传承集体价值观念并稳定社会组织结构的可持续性，以及独特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维持系统稳定的可持续性。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过程中，遗产地可以充分利用农业文化遗产的生物资源、技术资源、生态资源和文化资源，通过产品增值、乡村旅游实现产业振兴、人才振兴与生态振兴，通过文化驱动实现文化振兴与组织振兴（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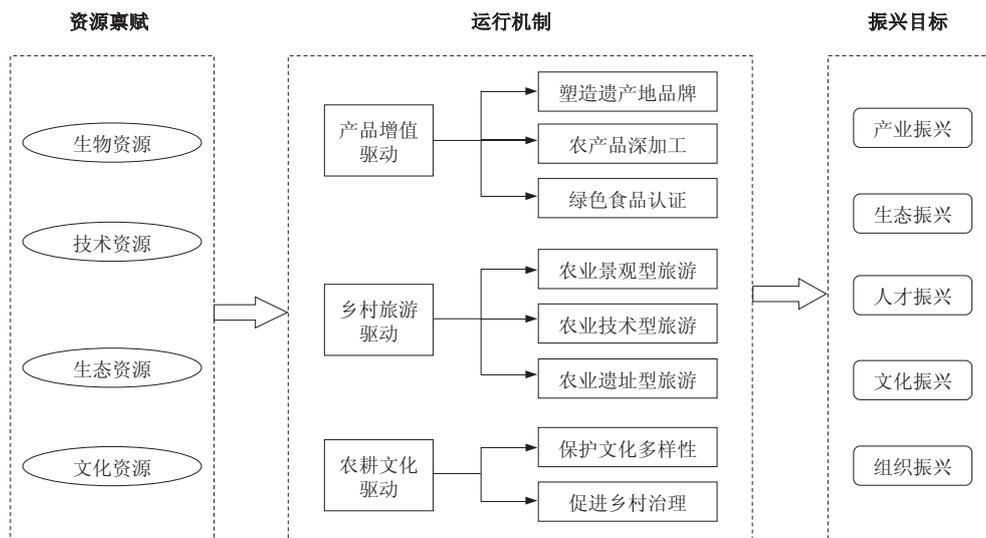


图 1 农业文化遗产助力乡村振兴的运行机制

Fig. 1 Operation mechanism of agricultural heritage to help rural revitalization

### 3.1 产品增值驱动

农业文化遗产所蕴含的独特的生物资源以及“天人合一”的绿色生产理念，能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高质量”和“多元化”需求，这为遗产地产品的品牌化和高端化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

农业文化遗产具有突出的经济、生态、社会和文化价值的独特品种资源，例如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的红米，内蒙古敖汉旱作农业系统的小米，以及相关茶叶、香菇、杨梅等经济作物，是农业文化遗产地通过产品增值驱动乡村振兴的基础。遗产地的政府、企业和农户需要注意收集、复壮和推广这些传统品种资源，保护优势品种资源；通过体现遗产地产品自然特色、地域特色、加工工艺特色、文化特色、民族特色的品牌和营销规划，塑造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遗产地品牌；同时探索相关农产品的资源整合以及后续加工产品的开发，延伸产业链。

遗产地独特产品的价值提升不仅能驱动遗产地的产业振兴，还能帮助遗产地实现人才振兴。研究表明，乡村人口向城镇迁移并不单纯因为收入差距的问题，即使在同等收入水平下，由于城镇地区发展前景更好，遗产地农户也可能会离开家乡去更发达的城市谋生。因此遗产地的产业振兴能帮助人们看到发展的机会，进而吸引具备一定知识技能的高素质人才回乡创业就业，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保障。同时，农产品增值能帮助遗产地转变产业结构，摒弃污染密集型产业与高耗能产业，保护遗产地的青山绿水，进而实现生态振兴。

### 3.2 乡村旅游驱动

产业单一化是乡村经济衰败的重要原因。我国

的众多农业文化遗产大多分布在传统农业地区，具有生态良好、环境优美、民风淳朴、文化多样等特点。同时，除了农业文化遗产系统本身之外，遗产地还具有其他诸如山水、技艺、民俗、节庆等物质形态或非物质形态的丰富的旅游资源，受到了很多旅游者的青睐。遗产地可凭借其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推出众多极具特色的旅游产品，开发集体闲度假、生态保健、文化感知和商务谈判为一体的旅游产业，同时积极宣传当地优质农产品和文化产品，推动遗产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吸引优秀青年人才回乡就业。

一般而言，农业文化遗产地可以通过三种乡村旅游发展模式来驱动乡村振兴。一是农业景观型—资源带动市场模式。多数农业文化遗产都具有一定的景观和观赏价值。其发展的关键在于资源，需要在自然景观资源的基础上挖掘人文景观资源，通过主体资源与辅助资源、有形资源与无形资源的配合，构成持续机制。江苏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集森林、水域和农田为一体，其独特的垛田景观与丰富的景观元素吸引了众多海内外游客前来观赏游玩。旅游业极大地促进了兴化当地的经济的发展，2013年间，超过100万游客前来观光游览，累计收入4.2亿元，比2012年增长7.7%，同时新增300个就业岗位<sup>[33]</sup>。

二是农业技术型—市场带动资源模式。农业文化遗产系统本身所蕴含的适应性技术和传统知识本身就是一种十分宝贵的旅游资源，但其发展的关键在于市场，要打造研学市场，促使“到处看看、随便听听”向“学习知识、体验文化”的转型。如浙江青田归国华侨杨小爱女士研发农遗餐，建立农遗

主题酒店，打造方山谷农遗文化园，通过接待小学生割稻、插秧和放鱼苗，带领他们走进农遗，了解农遗，感受稻鱼共生系统的魅力。这类模式不仅带动了当地旅游业发展，还能吸引企业家、海外华侨、优秀青年等回归家乡，建设家乡，促进了遗产地的人才振兴。

三是农业遗址型一节事活动带动模式。一些农业文化遗产地存在一些早期的农业遗址，具有较高的历史学价值。其发展的关键在于节事创意，通过深挖地方文脉，将活态的展示形式与静态的遗址资源相结合，鼓励社区农户参与。云南红河通过当地文化产业繁荣带动旅游业发展，依托哈尼梯田流传千年的历史文化，推出了一批与遗产地“土司文化”和“稻作文化”等紧密联系的文化节日，打造了以节事活动为主体的旅游路线。

但作为一种新型的旅游资源，农业文化遗产还具有脆弱性和濒危性的特点，其文化传承还存在传统与现代的背离、文化传承的代际失衡等问题。旅游开发是一把双刃剑，在推进农业文化遗产的乡村旅游中应注意文化传承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使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文化得以正常传承和发展。

### 3.3 农耕文化驱动

文化多样性保护是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点。农业文化遗产的文化积淀有助于了解和继承历史记忆，保存传统知识和技术，传承乡土集体价值观，促进民众的文化自觉；有助于保护乡村文化的多样性，进而使其各项功能良好发挥；有助于有效保存文化资源，为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和农业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资源基础。

农业文化遗产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可传承乡风文明，促进乡村治理，进而驱动遗产地乡村振兴。中国农民的主要形态是以小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小农，马克思将小农的特点概括为安于现状、听天由命、平均意识浓厚等<sup>[34]</sup>。小农对市场波动与自然灾害的抵抗能力较弱，致使其看待事物难免有局限性。现代的乡村管理方式可能难以达到“自治、法治、德治”的目标。然而，农业文化遗产蕴含的乡风文化弘扬真善美，传递正能量，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契合，提倡村民尊老爱幼，诚信友善，有助于提高村民的法律意识与道德意识，在乡村管理中因势利导、顺势而为。部分遗产地的一些古老村规仍然流传至今，在基层管理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如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的“刻木分水”制度，有效解决了农户的用水纠纷。分水时，由村

里德高望重的老者牵头，组织大家商议好每户的用水量，然后再根据用水量在坚硬耐用的横木上刻下凹槽，将其放在分水口处，开口宽则分到的水多，反之则分到的少，村里还会专门安排“赶沟人”巡视分水渠，保证渠道畅通。

## 4 农业文化遗产助力乡村振兴的路径

目前，我国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所在地具有一些显著特点：基础设施薄弱、经济发展落后；生物资源丰富、生态系统脆弱；传统知识丰厚、技术体系完善；文化资源富集、乡村景观优美；人口数量较多、人才资源短缺。农业文化遗产地应当针对上述特点，充分利用资源优势与“后发”优势，实现“五个振兴”。

### 4.1 推进三产融合发展

实现遗产地产业振兴，促进当地一二三产业融合是关键。遗产地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应将农业文化遗产生物、技术、生态和文化四大资源，与现代技术手段、先进营销理念和网络舆论宣传等有效结合，因地制宜构筑遗产地独有产业体系，延长农产品价值链条，增加农产品附加价值，帮助农民实现生活富裕。

江苏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融合其资源禀赋与人文历史，凭借遗产地生态环境优良、文化资源丰富等优势，打造“天下第一垛”乡村生态旅游示范区，以生态旅游为契机，大力宣传兴化龙香芋、兴化香葱等生态农产品，开发垛上农民画等文旅产品，积极推动遗产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福建尤溪联合梯田发挥万亩梯田、万亩果园、万亩竹林资源优势，着力发展食用菌、优质稻、竹产品等优质产业，建立“联合梯田”品牌体系，与企业联合推出“食米”文创品牌、“农旅优品”系列品牌等，助力当地产业振兴。

### 4.2 积累优秀人力资本

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可为乡村振兴积累人力资本，乡村振兴可为遗产保护提供政策便利。遗产地应以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为契机，鼓励年轻人留乡创业，以故乡情怀为纽带，吸引企业家、海外华侨、优秀青年等回归家乡，建设家乡，在保护农业文化遗产的同时实现乡村振兴。实施人才振兴的重要路径是提高农民谋生技能，遗产地可培养农遗技艺传承人，在保护农业文化遗产的同时，增加了村民的谋生手段。

2017年返乡大学生刘海庆在内蒙古敖汉旗成立了小米生态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一方面带领当地

农民创业致富,另一方面摸索如何保护敖汉旱作农业系统,他还带领合作社社员在村内举办大型文化活动,唤醒当地民众对农业文化遗产的文化记忆。除此之外,青田县归国华侨金岳品,红河县带领村民创业的郭武六等都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

#### 4.3 促进农耕文化繁荣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保障,对于农业文化遗产包含的乡村民俗文化,应秉着扬弃的态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保留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村规民约,摒弃陈规陋习,帮助实现乡风文明,助力乡村治理新体系的建设。随着现代社会高速发展,一些传统民俗文化正逐渐流失,遗产地可将传统农耕文化保护与乡村文化振兴相结合,通过发展乡村文化旅游宣扬农业文化遗产传承的优良农耕文化,同时唤醒村民们心中的文化记忆,引导村民向善向美,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四川郫都林盘农耕系统蕴含的传统农耕文化形成了血缘—亲缘—地缘的差序格局,这种由血缘和亲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逐渐演变成传统社会组织,这些组织自成体系,维持社会生产稳定与社会安全稳定,在文化传承与教化上有着明显的优势和当代价值。同时,川西平原作为东西移民的交融地,东西移民带着各自家乡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习俗汇聚于此,共同融入巴蜀文化中,创造了当地的文化繁荣。

#### 4.4 保护良好生态环境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大背景下,传统高耗能产业将会被逐渐淘汰,绿色产业具有广阔发展前景。遗产地应牢牢把握后发优势,将农业文化遗产的传统耕作技术、水土资源利用模式与现代农业科技相结合,发展具有农遗特色的生态农业,在为人类提供高产优质农产品的同时,能有效保护遗产地生态环境与生态系统功能,美化乡村生活环境。2013年以来,贵州省黔东南州从江县建立3.8万亩稻—鱼—鸭养殖示范点,举办稻田养鱼、养鸭技术培训,引导村民合理开挖渔沟、种植稻谷、施用有机肥。建立绿色立体病虫害生物防治体系,科学挂放诱虫板,提升稻鱼鸭产品品质。同时,充分利用传统田鱼苗培育资源,增加传统稻鱼鸭养殖过程中的科技含量,提高鱼苗的成活率

农业文化遗产大多处于偏远闭塞区域,生态环境良好,生态资产丰厚,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水平较高。遗产地可尝试与周边地区建立区域生态补偿基金,在为周边地区提供大量生态系统服务的同时,获取一定的经济报酬。然而,关于农业文化遗产生

态系统服务评估的研究较少,尚没有一套针对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评估体系,农业文化遗产蕴含的生态价值仍不明晰,这使得在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时,缺少理论依据。

#### 4.5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是实现组织振兴的重要途径。基层党组织担负着教育党员、管理党员和监督党员的职责,是组织群众、凝聚群众和服务群众的重要力量。2018年1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要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成坚强战斗堡垒。能否建立健全基层党组织,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能否成功实施。

在建立健全基层党组织的同时,要充分发挥传统社会治理的积极因素,坚持法治、德治、村民自治相结合的治理结构,倡导农业文化遗产中利用行之有效的乡规民约,构建新型乡村社会治理体制。贵州省黔东南州从江县加榜乡的“垃圾银行”制度属于基层自治的典型范例,对于一些原先乱丢乱弃的垃圾,村民都按照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进行分类,村里会派专人上门收取这些垃圾并向村民支付费用,这一基层管理制度有效扭转了垃圾乱扔现象。

### 5 结论与政策启示

#### 5.1 结论

农业文化遗产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作用。研究表明,遗产地通过农产品深加工、绿色食品认证、塑造遗产地品牌等方式延长农产品价值链,通过构建农业景观型、技术型、遗址型旅游发展第三产业,进而实现遗产地三产融合发展、高耗能产业转型与人才积极回流,最终实现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和生态振兴;同时,遗产地可通过传承乡风文明、保护农耕文化多样性等方式,促进乡村党组织建设与新型治理体系的构建,最终实现乡村文化振兴和组织振兴。

在乡村振兴战略中,产业振兴是基础,人才振兴是关键,文化振兴是灵魂,生态振兴是支撑,组织振兴是保障。农业文化遗产作为一座生物、文化、技术“基因库”,凭借其传承千年的资源禀赋,可以有力推动遗产地的文化传承、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最终建立起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现代化农村,并为世界农业农村的振兴工作贡献中国智慧。

#### 5.2 政策启示

1) 加强农业文化遗产价值评估研究。农业文

化遗产价值评估研究分为价值体系构建与评估方法研究。在价值体系构建方面，应紧扣农业文化遗产的复合性、活态性和战略性等特点<sup>[14]</sup>，发掘核心价值，建立一套统一有效的价值体系；在评估方法研究方面，应充分借鉴业已形成的自然资源资产价值评估方法、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着力解决评估结果“虚高”等问题，帮助人们客观认知农业文化遗产价值。

2) 建立农业文化遗产地生态补偿机制。过去我国区域间生态补偿标准主要通过协商博弈<sup>[37]</sup>、受偿意愿<sup>[38]</sup>等确定，缺乏生态学依据。应加强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流动—消费联级模式在生态补偿实践中的应用，加强生态补偿机理研究，探寻补偿标准、补偿方式对生态补偿效益的影响，积极探索多元长效补偿机制，架起从“绿水青山”通往“金山银山”的桥梁，为乡村振兴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提供资金支持，促进遗产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3) 实施农业文化遗产乡村振兴系列工程。实施农业文化遗产的文化振兴工程，以传统农业文化保护与传承为重点开展农村生态文化建设，强调社区居民在文化保护中的作用，提高民众的文化自觉；注重文化适应，注意保护特定的、对区域可持续性和社区发展有益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组织方式。实施农业文化遗产的生态振兴工程，总结并推广农业文化遗产系统在生态关系调整、系统结构功能整合等“软”关系方面的微妙处理，充分发挥农田、草地、水域、森林、湿地等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同时避免一些负面效应的产生，如面源污染、温室气体排放和农药化肥的过量使用等。实施农业文化遗产的产业振兴工程，在保护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农业文化遗产独特的品种资源、文化资源和景观资源，将生态环境保护与绿色农业发展有机结合，将农业文化遗产的独特品牌，有效带动遗产地农民的就业增收，推动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4) 实施农业文化遗产振兴乡村的示范工程。根据区域和类型分布，总结农业文化遗产振兴乡村发展的典型模式；从区域优势、成本效益、参与程度等角度，分析各种模式的适用性与可推广性；引入新技术提升传统农作技术和农作模式，推广以低碳、循环、绿色为核心的高效生态农业模式。

#### 参考文献：

[1] 王亚华, 苏毅清. 乡村振兴——中国农村发展新战略[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7(6): 49-55.  
Wang Y H, Su Y Q. Countryside revitalization—New strategy for

Chinese rural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the Central Institute of Socialism, 2017(6): 49-55.

[2] 闵庆文, 曹幸穗. 农业文化遗产对乡村振兴的意义[J]. 中国投资, 2018(17): 47-53.  
Min Q W, Cao X H. The significance of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J]. China Investment, 2018(17): 47-53.

[3] 刘旭, 李文华, 赵春江, 等. 面向 2050 年我国现代智慧生态农业发展战略研究[J]. 中国工程科学, 2022, 24(1): 38-45.  
Liu X, Li W H, Zhao C J, et a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modern smart ecological agriculture[J]. Strategic Study of CAE, 2022, 24(1): 38-45.

[4] 李文华. 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J].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2015, 34(1): 1-6.  
Li W H. Agri-cultural heritage research and conservation practices: Progress and perspectives[J]. Journal of Agro-Environment Science, 2015, 34(1): 1-6.

[5] Bai X M, Shi P J, Liu Y S. Realizing China's urban dream[J]. Nature, 2014, 509(7499): 158-160.

[6] Chen R S, Ye C, Cai Y L, et al. The impact of rural out-migration on land use transition in China: Past, present and trend[J]. Land Use Policy, 2014, 40: 101-110.

[7] 卢思齐, 刘情, 郑凡, 等. 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环境污染问题及对策分析——以河南省为例[J]. 农学学报, 2019, 9(8): 92-100.  
Lu S Q, Liu Q, Zheng F, et al. Rural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countryside: A case of Henan province[J]. Journal of Agriculture, 2019, 9(8): 92-100.

[8] Zhou Y, Li Y M, Xu C C. Land consolid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ina: Mechanisms and paths[J]. Land Use Policy, 2020, 91:104379.

[9] Yang J, Yang R X, Chen M H, et al. Effect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on rural tourism[J]. Journa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Management, 2021, 47(4): 35-45.

[10] Xue E R, Li J, Li X C.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rural area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ina: A comprehensive policy circle analysis[J]. Sustainability, 2021, 13(23): 13101. DOI: 10.3390/su132313101.

[11] 傅志强, 黄璜.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在湖南乡村振兴中的作用与发展对策[J]. 作物研究, 2021, 35(5): 405-408.  
Fu Z Q, Huang H. The role of important agricultural cultural heritage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Hunan province and its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J]. Crop Research, 2021, 35(5): 405-408.

[12] 陈茜. 农业文化遗产在乡村振兴中的价值与转化[J].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 2020, 12(3): 133-140.  
Chen Q. The value and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heritage in rural revitalization[J]. Journal of Ethnic Culture, 2020, 12(3): 133-140.

[13] 闵庆文.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一种新的世界遗产类型[J]. 资源科学, 2006, 28(4): 206-208.  
Min Q W. GIAHS: A new kind of world heritage[J]. Resources Science, 2006, 28(4): 206-208.

[14] 闵庆文, 孙业红. 农业文化遗产的概念、特点与保护要求[J]. 资源科学, 2009, 31(6): 914-918.  
Min Q W, Sun Y H. The concept, characteristics and conservation

- requirements of agro-cultural heritage[J]. Resources Science, 2009, 31(6): 914-918.
- [15] 李文华, 刘某承, 闵庆文.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 生态农业发展的新契机[J]. 中国生态农业学报(中英文), 2012, 20(6): 663-667.  
Li W H, Liu M C, Min Q W. Agri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New opportunity for developing eco-agriculture[J]. Chinese Journal of Eco-Agriculture, 2012, 20(6): 663-667.
- [16] 刘某承, 张丹. 生态文明背景下农业文化遗产的传承利用[J]. 中国生态文明, 2019(2): 34-36.  
Liu M C, Zhang D. Inheritance and uti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cultural heritag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J]. China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2019(2): 34-36.
- [17] Yang L, Yang J H, Jiao W J, et al. The evaluation of food and livelihood security in a 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GIAHS) Site[J]. Journal of Resources and Ecology, 2021, 12(4): 480-488.
- [18] 孙业红, 闵庆文, 成升魁. “稻鱼共生系统”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价值研究[J]. 中国生态农业学报, 2008, 16(4): 991-994.  
Sun Y H, Min Q W, Cheng S K. Value of the GIAHS-China traditional rice-fish system[J]. Chinese Journal of Eco-Agriculture, 2008, 16(4): 991-994.
- [19] 周静怡, 赵璐峰, 唐建军, 等. 稻鱼共生系统农田边界的植物和丛枝菌根真菌调查——以首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稻鱼共生系统核心保护地浙江青田龙现为例[J]. 中国生态农业学报(中英文), 2022, 30(6): 889-899.  
Zhou J Y, Zhao L F, Tang J J, et al. Plant and arbuscular mycorrhizal fungal in the field margins in the 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rice-fish system[J]. Chinese Journal of Eco-Agriculture, 2022, 30(6): 889-899.
- [20] 王斌, 闵庆文, 杜波, 等. 会稽山古香榧群农业文化遗产生态服务价值评价[J]. 中国生态农业学报, 2013, 21(6): 779-785.  
Wang B, Min Q W, Du B, et al. Research on ecosystem services value of ancient *Torreya grandis* in Kuaiji Mountain[J]. Chinese Journal of Eco-Agriculture, 2013, 21(6): 779-785.
- [21] 缪建群, 王志强, 杨文亭, 等. 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 生态科学, 2018, 37(4): 218-224.  
Miao J Q, Wang Z Q, Yang W T, et al. Development status, problems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of Chongyi Hakka terrace ecosystem[J]. Ecological Science, 2018, 37(4): 218-224.
- [22] 缪建群, 王志强, 杨文亭, 等. 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J]. 应用生态学报, 2017, 28(5): 1642-1652.  
Miao J Q, Wang Z Q, Yang W T, et al. Ecosystem services of Chongyi Hakka terraces[J]. Chinese Journal of Applied Ecology, 2017, 28(5): 1642-1652.
- [23] 张碧天, 闵庆文, 焦雯璐, 等. 不同轮作模式的地下水调节服务对比研究——以成都市郫都区为例[J]. 环境生态学, 2020, 2(8): 9-15, 42.  
Zhang B T, Min Q W, Jiao W J, et al. Comparative study on groundwater regulation services of different paddy-upland rotation models—A case study of Pidu district, Chengdu city[J]. Environmental Ecology, 2020, 2(8): 9-15, 42.
- [24] 李文华. 生态农业——中国可持续农业的理论与实践[M].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3.  
Li W H. Ecological Agricultur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in China[M]. Beijing: Chemical Industry Press, 2003.
- [25] 王静禹, 周逸斌, 孟留伟, 等. 湖州桑基鱼塘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评估[J]. 蚕业科学, 2018, 44(4): 615-623.  
Wang J Y, Zhou Y B, Meng L W, et al. Evaluation on service value of mulberry-base fishpond ecosystem in Huzhou[J]. Science of Sericulture, 2018, 44(4): 615-623.
- [26] Terjesen B F, Chadwick T D, Verreth J A J, et al. Pathways for urea production during early life of an air-breathing teleost, the African catfish *Clarias gariepinus* Burchell[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Biology, 2001, 204: 2155-2165.
- [27] Xie J, Hu L, Tang J, et al. Ecological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agricultural heritage rice-fish coculture system[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1, 108(50): 19851-19852.
- [28] Renard D, Iriarte J, Birk J J, et al. Ecological engineers ahead of their time: The functioning of pre-Columbian raised-field agriculture and its potential contributions to sustainability today[J]. Ecological Engineering, 2012, 45: 30-44.
- [29] Zhu Y Y, Chen H R, Fan J H, et al. Genetic diversity and disease control in rice[J]. Nature, 2000, 406(6797): 718-722.
- [30] 苏本营, 陈圣宾, 李永庚, 等. 间套作种植提升农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J]. 生态学报, 2013, 33(14): 4505-4514.  
Su B Y, Chen S B, Li Y G, et al. Intercropping enhances the farmland ecosystem services[J].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13, 33(14): 4505-4514.
- [31] 袁正, 闵庆文. 农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N]. 农民日报, 2013-10-25(8).  
Yuan Z, Min Q W. Agricultur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N]. Farmer' daily, 2013-10-25(8).
- [32] Wang G P, Yang L, Liu M C, et al. The role of local knowledge in the risk management of extreme climates in local communities: A case study in a nomadic NIAHS site[J]. Journal of Resources and Ecology, 2021, 12(4): 532-542.
- [33] Bai Y Y, Sun X P, Tian M, et al. Typical water-land utilization GIAHS in low-lying areas: The Xinghua Duotian agrosystem example in China[J]. Journal of Resources and Ecology, 2014, 5(4): 320-327.
- [34] 郑琼琰. 马克思小农特点论述的宪政分析[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6): 113-118, 134.  
Zheng Q X. A constitutionalism analysis of Marx's discussion 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mall holder[J]. Journ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07(6): 113-118, 134.
- [35] 靳乐山. 以分类原则确定生态补偿标准[J].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21(10): 84-85.  
Jin L S. Determining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tandards based on classification principles[J]. Chinese Cadres Tribune, 2021(10): 84-85.
- [36] Liu M C, Bai Y X, Ma N, et al. Blood transfusion or hematopoiesis? How to select between the subsidy mode and the long-term mode of eco-compensation[J]. 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 2020, 15(9): 094059. DOI: 10.1088/1748-9326/ab9793.